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重点图书



河南

HENAN WENXUESHI  
DANGDAIJUAN

文学史·当代卷

张鸿声主编

郑州大学出版社

#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

主编 张鸿声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张鸿声主编. —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81106-799-6

I. ①河… II. ①张…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史—河南省 IV. ①I209.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9603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 王 锋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710 mm × 1 010 mm

印张: 35.75

字数: 66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 450052

发行部电话: 0371-66966070

1/16

印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81106-799-6 定价: 1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 序 一

由张鸿声先生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的出版,是河南文坛值得记述的一件大事。据我所知,早在1998年,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河南文学史》的研究课题就被列入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批准号为95B129)。《河南文学史》的总体设计为古代卷、近现代卷、当代卷,共三卷。王永宽、白本松两位先生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古代卷》已于2000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sup>①</sup>,《河南文学史·当代卷》近期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阅读《河南文学史·当代卷》,给我留下的突出印象是它较为鲜明的学术个性。

当代卷的第一个特点是:从文学实际出发,努力厘清发展线索,还原河南当代文学60年来意蕴繁复的历史形态。全书共19章,第一章至第六章为“十七年”河南文学研究;第七章描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河南文坛;第八章至第十九章研究新时期河南文学。从字数看,前7章约占全书的1/4,后12章约占全书的3/4,字数的差异反映了作者对河南当代文学发展的总体评价,突出了研究重点。“十七年”和新时期两个部分的概述,

---

<sup>①</sup> 详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河南文学史·古代卷》前言。

分别勾勒出了两个时段文学发展的基本轮廓,以下各章则按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散文与报告文学分门别类进行研究。根据文学发展的具体状貌,新时期文学部分还特意增设了影视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文学评论两章。

作家作品研究是贯穿全书的中心,对李准(两章)、姚雪垠、张一弓、二月河等作家开设了专章。这些透露出了这部史著结构安排上的匠心。表面上看,河南当代文学的发展是琐碎、零乱的,但是,在不规则中却隐藏着秩序,或隐或显地延续着河南文学发展的流脉。作为第一部《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作者给我们所提供的上述研究思路和文学史架构,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的。开放性永远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它鼓励风格的多样性、差异性。文学史研究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思维空间和多向度的审美畛域。此后,也许会出现各种式样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但本书第一部的价值则会永存。

地处中原的河南文学,承载着太多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作家创作艺术经验的总结,是《河南文学史·当代卷》用力之所在,并构成了全书另一个显著特色。第一章河南当代文学概述中的“河南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一节,要言不烦地对河南文学的精神特征,粗线条地梳理出了一条明晰的发展线索。在此基础上,书中的相关章节,进一步对此问题进行了有深度的研讨,力求做到研究的学术性、精神性的统一。作者认为,苦难是河南作家笔下的永恒母题,对待苦难,河南人采取的重要方式是挺起胸膛与之抗争。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阎连科的《耙耧天歌》、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展现了几代农民在苦难来临之际义无反顾的选择。和这类作品主题类似的,还有李准的《黄河东流去》、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和张宇的《乡村情感》等。通过对作品细致的解读,《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作出了带有规律性的概括:在 20 世

纪,河南“天灾人祸不断,使原本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成为一个灾难重重难以生存的地区。在这个地区生存的中原人,在这困难的环境中,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具有更为强烈的抗击苦难的能力。当苦难成为中原人生活中时刻出现的阴影的时候,中原人面临苦难也表现出了或者刚烈或者韧性的战斗精神;当对苦难的抗争成为中原人生存必须不断面临的问题的时候,在中原也就形成了坚韧厚重的文化理念来对抗苦难。在中原作家笔下,也就展示了中原人的面对苦难的顽强”,“可以说,中原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原独特的人文文化精神”。这段平实的叙述包容着作者对中原人强悍主体性的彰显。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揭示:展现中原人面对苦难的顽强与对中原文明负面影响的批判,实际上构成了河南作家创作的两翼。

河南当代作品对中原文明的理性批判精神,再现了当代河南作家的思想能力,也是他们对我国当代文学最独特的贡献。《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作者认为,乔典运、刘震云作品对奴性意识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书中作了这样的概括:“河南当代作家对中原文明的批判,首先指向的是在长期政治文化奴役下形成的奴性。长期的封建专制奴役,使得农民逐渐自觉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性,而把自己置于‘官’的奴隶这个位置上。由于中原古代政治文化的发达,这样一种奴性人格,在中原乡村最为常见,河南作家就有意识地对这样一种奴性人格,以及隐藏在其后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批判和探讨。乔典运被视为当代文学中进行国民性批判写作的重要作家,他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深刻地批判和剖析了奴性造成的人格扭曲以及奴性形成的根源。刘震云对中原文明的负面因素显然也是深有体悟,在他的《故乡相处流传》里,民众今天依附曹操,明天又歌颂袁绍,缺少固定的道德操守,只有生存本能和利益追求。当民

众过于强调生存利益时,奴性就成为他们捍卫自我利益的重要手段;而当奴性意识内化为一种心理本能时,也就异化成对等级秩序的自觉依附和维护。河南作家敏锐地发现了深蕴在大平原民众身上的这种奴性人格,将之解析出来,予以了犀利的批判”。这种“犀利的批判”,涌动于中原各类体裁的作品之中,展现了文学对于中原农民命运深切的当下关怀。姚雪垠、二月河的历史小说,田中禾、李洱反映现实的小说,周同宾、卞卡的散文,都具有深度地揭示中原文化结构的顽固性之特征。

在对具体文学现象剖析中,《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也不乏精彩的论断。在论述河南当代文学致命弱点时,借用作家张宇的话陈述自己的观点:“作家张宇曾经不痛心地说过河南人的两大病灶:一曰唯上,二曰跟风。正是这样的一种负面的精神,才使得具有自省意识的中原作家写出了一系列的对中原文化精神批判的文章。”“唯上”、“跟风”,正是在一段时间内河南人甚至包括河南作家的某些症结所在。张宇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在评论作家白桦的《苦恋》时,指出:作品“对社会体制的弊病提出了追问。”一句精辟的概括,阐明了《苦恋》的文学史意义。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不无自信地告诉人们,对于河南作家来说,他们“写作手法也许不是最先进的。事实上,河南作家在这方面似乎一直都不能引领潮流,但是,依靠着深厚的中原乡土文化,河南作家以他们土气的笔调,书写着一种沉重的文化精神”。这些看似平实无奇的书写,却是入木三分的明快之论。

再次,对研究对象的理性审视,同样是这部著作的一个亮点。在乡土文学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过分偏爱,对故土难以割舍的恋情,常常会使人在研究对象面前失却了分寸,从而把对故土的怀念和研究本身混搅在一起,难舍难分,最终研究被沦落为缺乏可信度的个人崇拜记忆。《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并非完全挣脱了故

土情结的藩篱,但总体上看,它相当明确地坚持了史家的客观公正立场。文学史对“十七年小说”不足之处的评论开门见山:“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株守于河南的地方一隅,固执于中原文化的封闭自足,缺乏一定的开放性,显得底气不足。加以过于紧跟并配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文学作品往往成为一时的政策之概念化的图解,致使其文化视野相对褊狭,因时代发展而显得面目陈旧,从而大大地影响了文学境界的提升与整体气度的恢弘。”对受人尊敬的河南当代文学大家姚雪垠、李准,在肯定姚、李贡献的同时,也以锐利的史家眼光,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他们各自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如说:“有论者认为,《李自成》存在反历史主义的现象,不是写李闯王时代的农民革命,如当时闯王和部将都是这样,革命早成功了。的确,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尤其是对李自成义军生活的描写不够真切、细致、深刻、感人……有些地方因为过于概念化,显得拘谨、呆板、浮泛、生硬,不大可信,比如第二卷写刘宗敏审判吕维祺这一段,一个不通文墨的大老粗在理学名儒面前雄辩滔滔,长篇大论地批判孔孟,似乎不大合乎生活的情理,也有悖于这位总哨刘爷剽悍粗猛的性格,做作别扭”;又如,评价李准的“十七年小说”也能直击作品的软肋:“李准的小说在题材上相对较为单一,一直保持着对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黄泛区等几个主题的持续关注,尽管在今天看来,其中的某些作品因为包含着隐性的民间文化结构以及审美趣味与古典传统相衔接,而不乏艺术上的独特魅力,但由于特定的政治氛围与主流话语的影响,这些小说也明显地患上了时代的幼稚病。它们大多都主题雷同、情节结构类似、语言风格接近,从而使得本来应该千姿百态、富于个性特色的小说创作,反而出现了千人一面的共同模式。有一部分作品更是等而下之,甚至沦为政治的喉舌与一时政策的传声筒。”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带来的可能是惯性的约束力,并从而使作家心生拘谨。这一

点,连才气横溢的李準也无法幸免。

我赞赏《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作者对河南作家创作中存在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因为,对于河南文学的发展来说,或许最缺乏的是对自身的反思。回顾河南现代、当代文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到,20世纪上半叶,作家各自为战,缺乏交流切磋,小有所获,即生一种小农式的自足,既缺乏对自身前进的必要反省,更不具备整体反思的条件,创作上作为一个群体在国内一直处于弱势;下半叶自上而下建立了各种组织、各式协会,但也并不表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大,在一个时期内,许多作家的创作不得不俯首听命,严格服从舆论一律,虽有个别勇敢者在艺术上独辟蹊径,往往预后不良,轻则受斥,重则受到殃及生计的严厉惩戒,终至创作灵气消逝,心态上的得过且过制造出的是大量缺乏棱角的平庸之作;近些年来,创作虽大有起色,但仍显底气不足,在自我反思十分缺乏的氛围里,报刊上接连袭来的赞扬声,有可能被误读为创作已达理想之地。中原文学要进步,当务之急是真枪实刀地戳戳自己的痛处。一些作者对中原文化的反思虽曾使我们惊喜,但反思的声音十分微弱,反思的层面往往也仅限于政治层面,缺乏对中原文化自身的深入探问。<sup>①</sup>

早在本世纪初年,文学理论家孙荪就曾经从审美趣味的视角,批评过创作中出现的这一直接影响作品思想深度的现象:“以歌颂美善为鹄的审美趣味,是文学豫军长期养成的一大长处,但在不自觉中也发生了一个问题:对生活中的丑恶有时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回避。李準就坦言他不会写丑,这话从骨子里不无自得之意。实际上对此不应当简单地称道,一味美善,回避丑恶,直面真实的勇气就打了折扣,有可能减弱对生活特别是人性刻

---

<sup>①</sup> 苏金伞的诗作《反省》,表现了刘少奇在开封“痛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这一历史悲剧。诗中责问: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在刘少奇“死去十年竟默不作声”?

画的深度。写美不易,写丑也不易,从艺术的意义上来讲,把丑写美更不易。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采取了一个孩子的眼光,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神灵’的目光,对城市的病灶或者说人性的丑恶进行了透视。尽管作者对这种追逐金钱的恶行与中国长期贫困的关系还梳理得不够清楚,对人性美善的呼唤还显得苍白,但对恶欲的暴露和批判总是对人性的净化。”<sup>①</sup>这段温和的批评显然意犹未尽,事实上,这一现象的出现事出有因。它虽然和审美趣味有关,但是,更主要地,还应该从特定的语境来寻找真正的答案。《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在这方面迈出的步子虽然不算太大,但它却是一种理直气壮的正视,意义深远的起步。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值得推崇和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与具有力度的思想开掘相比较,对艺术形式创造经验的总结略显逊色,但有些问题的分析,也恰到好处,自有玄妙,如对《朝阳沟》至今仍具有艺术魅力的分析就相当精辟:“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只能使得这个戏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当时的大跃进思潮已经被证明错误的今天符合大跃进时期宣传需要的作品仍然有生命力,说明其有着其本身深厚的艺术内涵,事实上,这个戏在故事的表层对主流意识形态表示服膺的同时,在戏剧的内在冲突上,作家是有意识地规避了当时社会中过于‘左倾’的、不符合日常生活的东西,努力按照日常生活形态营构戏剧内在冲突,就使得《朝阳沟》在表层叙事的社会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情况下,内部叙事隐含了一重‘民间隐形结构’,从而使得戏剧得以避开了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戏常有的大而无当的毛病,具有了动人的艺术魅力”,入情入理的细腻解读,无形中增强了这部历史著作的可信度和艺术感染力;又比如,第十九章《新时期的文艺理论与文学评

---

① 孙荪:《文学豫军论》,《精神中原》第67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论》也写得实实在在,对河南文学理论建设“在新时期取得了长足进步”的概括就相当准确。我的印象是,在创作评论方面,比如:刘思谦的激情四射,孙荪的从容得体,鲁枢元的敏锐大气,何向阳的灵透脱俗,个性凸显,其影响已远播国内外,就是真真切切的“长足进步”,但由此,我眼前竟也隐约地浮现出了众多前辈的面影:五四之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嵇文甫、赵纪彬,历史学家范文澜、尹达、孙作云、孙海波,文学史家李嘉言、万曼、张长弓、栾星,小说家兼文学史研究家冯沅君、姚雪垠,文字学家朱芳圃、于安澜,创办《猛进》周刊而知名的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徐旭生,和为研究河南近代历史潜心整理《中州先哲传》、《中州诗征》等 127 卷的中州文献征集处总编辑李敏修,等等,其在学术研究中的沉稳和扎实,眼光的新颖和犀利,堪称河南后学之楷模。他们学养湛清、文史兼通。学术研究贵在打通,无道则隔,有道则通,通则有通瞻熔裁之功力。我辈所欠,正在“打通”二字。理论研究有时不欠缺贫乏的精明,但它成于坚韧,毁于浮躁。本章的设立与其说是对研究成绩的总结,不如看做是对现代中原学人的告诫与提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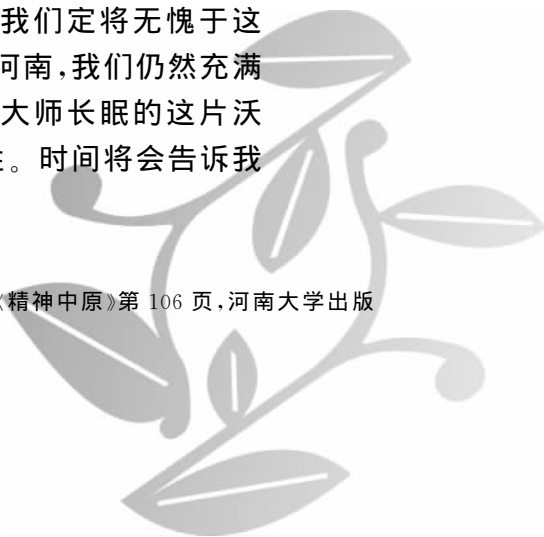
事实上,当代文学史研究最大的一个难题,是它无法与当代生活拉开距离。当代文学 60 年中,经过历史的检验,前 30 年的文学形态已经看得明白了许多,从而为进行历史描述提供了可能性。而后 30 年则尚未经历时间的汰选,近距离驰入河南文学的文山艺海,史的建构的热情,再加上感情因素的纠缠,极易使研究者眯眼、走神,难以清晰地判断文学思潮发展的隆替变异。史即史,而非文学评论。对此,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研究者,同样应该格外的小心谨慎,还有,这是一部以集体之力完成的史著。显然,多人合作能够提供不同个体的卓见睿识,但也可能带来体例上的不尽统一等问题,同样也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使其日臻完善。这些,我极愿与

本书作者共勉。

在本书《结语》中,主编张鸿声满怀喜悦地对河南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新旧世纪之交,“面对社会人生的种种境况,透过时代的喧哗扰攘,庞杂芜劣,异常敏感的文学触角表现出对生命的丰富感性的热烈拥抱和对生命的丰富底蕴的执著开掘,从而建构起文学世界多元共存、血肉丰盈的空间。其中当然有粗制滥造之作,但就其主流部分而言,20世纪末至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确实涌现出一大批颇具艺术分量和思想深度的作品。这些作品在题材、结构、叙事等方面都显示出娴熟自如的风格。大气已成的文学豫军是一支世人瞩目的小说创作队伍,为文坛贡献了一系列大气磅礴的优秀作品。”我总体上认同他的精彩评论和价值判断。当然,在我看来,张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大气磅礴”、“大气已成”,更多地还是反映了他本人以及许多中原学人对文学发展急切的企盼,但河南文学的路还很长。路在前,接力棒在前。生命不息,跋涉不止。遥想古代这块道家、墨家、名家、法家、杂家和纵横家诞生地的中原文学,当年是何等的光华、葱绿、轻盈、明亮、飞动、安详,才是最高境界的“大气磅礴”、“大气已成”,比起这些先哲前贤,虚心一点说,我们目前的河南文学,除了几株略为粗壮的大树外,更多的还只是一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灌木丛。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气馁。一位对中原文学深有研究的学者就说:“我们喜爱这块养育了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土地。我们定将无愧于这块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凝望河南,我们仍然充满感激和自信。”<sup>①</sup>在无数思想家、文学大师长眠的这片沃土上,事实上存在着多种新的可能性。时间将会告诉我们一切。

---

<sup>①</sup> 鲁枢元:《凝望河南——一种视觉化写作的尝试》,《精神中原》第10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刘增杰

2009年11月6日于开封



## 序 二

《河南文学史》是 1998 年被批准立项的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批准号为 95B129,王永宽为课题负责人。课题申报计划对于本项目的设计是将全书分为“古代卷”、“近现代卷”和“当代卷”三卷,其中“古代卷”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永宽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白本松任主编,已于 2000 年完成,并于 2002 年 12 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近现代卷”和“当代卷”的编撰工作一时未能进行。

2004 年 6 月,经过协商,《河南文学史·当代卷》的编撰工作由当时任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张鸿声教授负责实施。鸿声教授随即精心组织有关学者,逐步展开工作,经过五年的辛苦努力,如今初稿告竣。这部书稿,洋洋洒洒 50 余万字,体例严整,章节明晰,内容详备,质量厚重。编撰者为河南省的文学,也为河南省的学术,贡献出一项有分量的新成果。这是令人高兴的,也是值得祝贺的。

《河南文学史》的编撰是一项大工程,一开始就需要有本省科研单位及有关高校同仁通力合作。“古代卷”就是由河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河南大学文学

院等全省部分高等院校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许多老师参与撰写、共同完成的。如今，“当代卷”则由郑州大学文学院从事当代文学及文艺理论教学的十几位老师分工合作，共襄盛举。鸿声教授作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并亲自撰写了有关重要章节，尤其是在他调离郑州大学到中国传媒大学任教之后，仍然没有放松这项工作，善始善终地带领原班撰写人员坚持完成既定任务。鸿声教授和课题组的全体同志表现出的执著的敬业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是令人感佩的，也是值得学习的。

当初在组织策划编著《河南文学史》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从古至今的河南文学发展史，时间跨度漫长，内容特别丰富，编撰这样的专史应在总体思路与框架结构方面建立起三维坐标系。坐标的横轴是时间，即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文学的传承、影响与时代特色；坐标的纵轴是空间，即历史演进的地域范围，作家的地域属性与作品的地域特征；竖轴则是文学本身，即文学的体裁、题材、人物、事件、思想、情感、语言、艺术、风格等。这样的三维坐标体系，可以立体地展示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清晰地观照文学包容的复杂层次。

尽管我的这一提议没有被认定是以某经典或权威著作作为依据，也没有被学界同行明确认同，但是，我认为，当代问世的不少专史著作，事实上都是体现着“三维坐标系”的构想，即是在表示时空的平面坐标之外，又以所述专史的领域建立起竖向坐标，构成一个立体的史学话语系统。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正是这样的“三维坐标系”的完整结构，立体地全景式地展示当代河南文学的发展历史。

其时间坐标是从建国开始直到当今。由于本书的写作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书中论述的作家

作品及文学现象的下限大体是到 2008 年为止。这将近六十年间的河南文学,其发展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十七年为第一阶段,“文化大革命”十年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年的新的历史时期为第三阶段。

其空间坐标是在河南省的地理范围之内,对于不同地域的作家的成就与特点进行了具体的论述。从整体来看,新时期崛起的文学豫军在全国文学界显示出独特的阵容和特点,而在河南省内出自不同地区的作家,其作品的内容与风格也明显地带有其地域风貌。书中特别列出专节对“南阳作家群”进行论述,分析其形成的历史与地域背景和独到的创作成就。

其文学坐标则是对于每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概况和具体作家作品进行分别论述:从体裁来看,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文学、影视文学、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研究等;从题材来看,分乡土小说、历史小说、城市文学、儿童文学等;从作者情况来看,又对于专业作家、女性作家、河南省外的豫籍作家、军旅作家等分别予以评说;从涉及的问题来看,对于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问题、乡土文学问题、小说的结构手法与语言艺术问题、文学新思潮问题等理论层面都有所论述。

这样,《河南文学史·当代卷》的内容丰富而不杂乱,详细而不繁琐,全书的结构纲举目张,条分缕析,整体呈现出一个严密而科学的理论体系。

然而,《河南文学史·当代卷》所建立的三维坐标系并不是孤立的。我们运用想象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大坐标中,它的上下四方同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华文学史乃至中国历史的内容互相衔接或叠合。从时间意义上来说,河南当代文学史并不是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平地而起,而是同中国现代文学史紧密相连,著名作家姚雪垠、苏金伞、李季等都是

在 20 世纪的 30 年代、40 年代就已经有所建树,而在建国后又不断推出新的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河南当代文学的成就与发展历程,是中国当代文学成就与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当代一些重要作家,如李准、魏巍、张一弓、姚雪垠、二月河、阎连科等,也是全国文坛上的一流作家。他们的文学道路及其主要作品的社会内容与思想倾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河南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十七年”充满生机的早期繁荣景象,“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万花纷谢一时稀”的萧条与畸形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河南文学的蓬勃发展及新成就、新思潮、新探索等,也和全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完全吻合。新时期的河南文学创作队伍被称为新崛起的“文学豫军”,作品在全国范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在中国的文学艺术界,而且在世界范围都相当引人注目。1999 年 1 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锲专门以“文学豫军”的崛起为题作了一次讲演。他提出:“我不止在一个地方呼吁,应当让全国的文学队伍,让全国的评论家们充分认识到‘文学豫军’的成长过程,‘文学豫军’的崛起。‘豫军’确实在中国文坛起着中坚的作用。”他的观点代表着一种舆论,这是对河南当代文学的成就与贡献的充分肯定。

作家创造文学史,而文学史家总结文学史;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历史、社会与人生进行反思,而文学史家在创作过程完成之后进行反思。《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就是一部对河南当代文学进行总结与反思的著作。总结与反思需要理性,而理性需要有更高远的视点和更广阔的视野。本书的作者在论述河南当代文学发展的时候,就不是仅仅立足于河南本土,而是站在全国、全人类的立场,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角度,全面地认识河南当代文学的成就、价值和意义。

本来,河南当代作家的创作中,其作品的题材范